

符号学译丛

丛书主编

赵毅衡

唐小林



符号与传媒
Semiotics & Media

本书系统地介绍了塔尔图符号学

是如何融会了洛特曼和乌克斯库尔的学术遗产，

发展出系统的生命符号学理论，

由此拓展了符号学研究的整个版图。

Semiotics of I

nes from Tartu

生命符号学： 塔尔图的进路

〔爱沙尼亚〕卡莱维·库尔(Kalevi Kull)

编

〔爱沙尼亚〕瑞因·马格纳斯(Riin Magnus)

彭佳 汤黎 等 译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3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项目号:13YJC720029 项目名:新塔尔图学派符号学研究

符号学译丛 ○ 丛书主编 赵毅衡 唐小林



本书系统地介绍了塔尔图符号学

是如何融会了洛特曼和乌克斯库尔的学术遗产,

发展出系统的生命符号学理论,

由此拓展了符号学研究的整个版图。

Semiotics of Life: Approaches from Tartu

生命符号学: 塔尔图的进路

〔爱沙尼亚〕卡莱维·库尔(Kalevi Kull)

〔爱沙尼亚〕瑞因·马格纳斯(Riin Magnus)

编

彭佳 汤黎 等 译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 冰
责任校对:陈 蓉
封面设计:米迦设计工作室
责任印制:王 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命符号学:塔尔图的进路 / (爱沙) 库尔
(Kull, K.), (爱沙) 马格纳斯 (Magnus, R.) 编; 彭
佳等译.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4. 8

(符号学译丛 / 赵毅衡, 唐小林主编)

ISBN 978-7-5614-7952-0

I. ①生… II. ①库… ②马… ③彭… III. ①生物学
—符号学 IV. ①Q-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90569 号

Semiotics of Life: Approaches from Tartu

By Kalevi Kull, Riin Magnus

Copyright by Department of Semiotics, University of Tartu

四川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进字 21-2014-147 号

书名 生命符号学: 塔尔图的进路

SHENGMING FUHAOXUE: TAERTU DE JINLU

编 者	〔爱沙尼亚〕卡莱维·库尔 瑞因·马格纳斯
译 者	彭 佳 汤 黎 等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14-7952-0
印 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70 mm×240 mm
印 张	13
插 页	1
字 数	249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 读者邮购本书, 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

电话: (028)85408408 / (028)85401670 /
(028)85408023 邮政编码: 610065

◆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 网址: <http://www.scup.cn>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前言

卡莱维·库尔，瑞因·马格纳斯

符号学这门研究意义产生过程和现象的古老学科，在 20 世纪 80 年代出现了重大的转向：它接受了关于符号过程的更有包容性的概念，并且将前语言符号也纳入了自身的研究范畴；而在当时，符号学主要进行的是对文化符号系统和逻辑的结构主义研究。在 80 年代发生的变化和以下相互关联的几点有关：第一，符号学门槛被降低至生命的起源；第二，皮尔斯符号学的广泛发展；第三，洛特曼符号域思想的引入；第四，生物符号学的发展，乌克斯库尔的理论被视为符号学的经典之一。

由此，生物符号学和稍后的生态符号学得以在全世界范围内发展。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哥本哈根和塔尔图的学者，以及世界各地的其他学者，在这一领域变得相当活跃。

为什么塔尔图能取得这样的进展呢？就其历史意义而言，塔尔图学者的符号学研究和他们采用的生命符号学进路是很有价值的。首先，由于塔尔图—莫斯科科学派对文化符号学的关注，从 20 世纪 60 年代早期，符号学就在这里得以发展。学派的领袖洛特曼提出了符号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可以运用于符号学的所有分支领域。塔尔图的生物符号学研究就从这一理论受益良多。因此，和其他地方的生物符号学研究不同，塔尔图的生物符号学是和文化符号学、广义符号学紧密相关、彼此融合的。其次，由于乌克斯库尔也是塔尔图的学者，塔尔图的知识传统也是和他以及他的前辈贝尔有密切关联的。

近年来，中国符号学界对塔尔图学派逐渐产生了强烈的研究兴趣。从 2011 年开始，《中国符号学研究》就为塔尔图开辟了固定的专栏。在《俄罗斯文艺》和《符号与传媒》中，也发表了塔尔图的两期专题论文。

本书是对塔尔图学者过去 15 年的著作的一本选集，它的作者既有生物符号学家，也有文化符号学家（和人类地理学家）。本书讨论的是符号学各个领域和各种符号学现象的交汇点，和生物符号学现象中的符号过程。其中几篇论文和乌克斯库尔的符号学以及洛特曼的文化符号学研究持有相同的理论立场，

它们强调现象及其解释的相互影响，提出了不同的模式，并指出了将符号学模式用于实际的环境问题的可能。

本书的第一部分“环境界与符号域”，探讨了生物符号学与文化符号学的交叉可能。在第一篇论文《塔尔图的符号学：雅各布·冯·乌克斯库尔和尤里·洛特曼》中，米哈伊·洛特曼和卡莱维·库尔对塔尔图符号学的两位大师学术思想的相似之处进行了总结，讨论了洛特曼的文本观和乌克斯库尔的环境界理论的对应之处，以及他们的著作中都体现出来的康德哲学观、浪漫主义影响和控制论的观点。在《环境界与符号域》一文中，米哈伊·洛特曼则把这两位奠基者的著作和基于因果关系和时间关系的经典叙述进行了对比研究。同时，他也指出了洛特曼和乌克斯库尔观点的不同，强调符号域理论的对话性。在《生物翻译：环境界之间的翻译》中，库尔和彼得·特洛普提出了生物翻译的概念，将人类的翻译视为语言翻译，而把环境界之间的信息交换视作生物翻译：这一概念实现了对文化和自然现象的领域的联结。凯伊·科托夫的论文《智域符号学和重要的符号》，强调了习性在符号域过程中的智域生产中的重要性。在特洛普的《符号域：作为文化符号学的研究对象》一文中，符号域的对话性也得到了强调，作者指出，符号域在对象层面和元层面上的功能开启了文化现象与其描述之间的互动。本部分的最后一篇论文是《环境界的文化根源》，瑞因·马格纳斯和库尔在文中对乌克斯库尔的理论如何运用于对文化现象的解释进行了分析，并指出了这一概念在未来的文化研究中的种种运用可能。

第二部分“生物符号学”，讨论的是生命体在互动中和对环境的参与中发生的符号活动。这一部分的开篇是库尔的论文《生物符号学的进展：我们在对意义生产的基本机制的发现上走到了何处》，作者在文中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生物符号学的范式发展进行了总结。在接下来的《梯形、树形、网形：生物学理解的时代》一文中，库尔将生物符号学的发展和生命模式的各时代进一步联系起来，作为生物学知识的基本组织原则。库尔的第三篇论文，《生命是多重的，而符号在本质上是复数：生物符号学的方法论》，为符号学和物质性的对象提供了解释，并对符号学系统的科学研究方法进行了描述。马格纳斯则在《生命体的时间计划：乌克斯库尔对生命构成的探索》中，讨论了物种特有的环境界构成之知觉时间现象和个体发生学的重要性。在该部分的最后一篇论文《生物拟态的符号学阐释》中，蒂莫·马伦将拟态作为符号学现象进行探讨，研究了像似性在拟态中的作用，以及拟态中符号的矛盾性和解释者的位置。

本书最后一部分的主题是生态符号学，这一领域研究的是文化与自然相互

影响的符号学现象。在《符号域与双重生态学：交流的悖论》中，库尔对符号学和物理学这两门看似无法比较的学科的研究方法进行了对比，并探讨了它们在生态系统中的运用，由此提出了 17 种不同的符号域的定义。在《符号生态学：符号域中的不同自然》中，库尔对人们解释和影响环境的方式进行了区分，并讨论了这些解释是如何与环境问题的产生相关的。由此，他提出了符号生态学这门学科的必要性。马伦的文章《地方性：生态符号学的一个基础概念》分析了生命体及其环境的互为条件性，以及环境的缺失会带来的生命体的结构变化。在《生态符号学的整一方法：自然文本的概念》中，马伦继续对符号学现象的语境意义进行讨论，他以塔尔图—莫斯科学派的文本概念为基础，提出了“自然文本”的概念，将自然现象与其在文化文本中的翻译都囊括其中。雷丝蒂·凯斯派克则在《对垃圾的符号学定义》中检视了洛特曼的理论，她将垃圾视为一种边界现象，它既是自然的产物，也是文化的产物。凯斯派克认为，符号学的定义有助于解决与垃圾相关的环境问题。本书的最后一篇论文是卡蒂·林斯特龙等人合写的《风景的符号学研究：从索绪尔符号学到生态符号学》，该文探求了风景研究的不同方法：索绪尔符号学、现象学和当代符号学。和本部分的其他几篇文章相似的是，几位作者最终集中讨论了洛特曼符号学理论和生态符号学在这方面的运用可能。

由于生态系统研究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以及广义符号学和生命研究对所有类型的符号过程的纳入，本书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塔尔图的符号学研究拓展了上述两个领域，它们是每个文化体的发展都可能面临的问题。

目 录

第一部分 环境界与符号域

塔尔图的符号学：雅各布·冯·乌克斯库尔和尤里·洛特曼	
..... 卡莱维·库尔，米哈依·洛特曼著	彭佳译（3）
环境界与符号域	米哈依·洛特曼著 汤黎译（12）
生物翻译：环境界之间的翻译	
..... 卡莱维·库尔，彼得·特洛普著	钱亚旭 彭佳译（17）
智域符号学和重要的符号	凯伊·科托夫著 汤黎译（27）
符号域：作为文化符号学的研究对象	皮特·特洛普著 赵星植译（31）
环境界的文化根源	瑞因·马格纳斯，卡莱维·库尔著 彭佳译（41）

第二部分 生物符号学

生物符号学的进展：我们在对意义生产的基本机制的发现上走到了何处	
..... 卡莱维·库尔著	彭佳译（61）
梯形、树形、网形：生物学理解的各时代	
..... 卡莱维·库尔著	彭佳译（71）
生命是多重的，而符号在本质上是复数：生物符号学的方法论	
..... 卡莱维·库尔著	彭佳译（80）
生命体的时间计划：乌克斯库尔对生命构成的探索	
..... 瑞因·马格纳斯著	彭佳译（89）
生物拟态的符号学阐释	蒂莫·马伦著 汤黎译（100）

第三部分 生态符号学

符号域与双重生态学：交流的悖论	卡莱维·库尔著 张颖译（121）
符号生态学：符号域中的不同自然	卡莱维·库尔著 彭佳译（130）
地方性：生态符号学的一个基础概念	蒂莫·马伦著 汤黎译（149）

生态符号学的整一方法：自然文本的概念 蒂莫·马伦著 彭佳译 (159)

对垃圾的符号学定义 雷斯蒂·凯斯派克著 彭佳译 (174)

风景的符号学研究：从索绪尔符号学到生态符号学

..... 卡蒂·林斯特龙，卡莱维·库尔，汉尼斯·帕朗著 彭佳译 (183)

新塔尔图研究：继承、融合与推进

——卡莱维·库尔教授访谈 卡莱维·库尔 彭佳 (196)

第一部分 环境界与符号域

塔尔图的符号学：

雅各布·冯·乌克斯库尔和尤里·洛特曼

卡莱维·库尔，米哈依·洛特曼著 彭佳译

创造是不能去语境化的，它总是和本土文化、生活的地方相关。一个学者的环境界是文化符号域的一部分。这种关系有时候被描述为“场所精神”（*genius loci*）。一个地方的精神不会属于当地的每个人：场所精神只存在于那些和自己同质的人身上。

美国一位科学历史学家简·奥本海默（Jane Oppenheimer），曾对 19 世纪欧洲最杰出的学者冯·贝尔（Karl Ernst von Baer）的生活和著作进行过分析。她发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模式。贝尔有一段时间曾住在爱沙尼亚，然后生活在德国的普鲁士和俄国。住在哥林斯堡（当时的普鲁士）时，他成功地用实验方法研究了生命体的发展和胚胎学，发现并且识别出了哺乳动物的卵细胞——这是个历史性的发现。当贝尔迁居到俄国以后，他没有继续研究胚胎学，而是专注于地理学和人种学，用公式阐明了河岸的不对称法则。在爱沙尼亚的塔尔图，一开始，他作为一个学生打下了理论基础；后来，他写了一部巨著批评达尔文的观点。由于某种原因，贝尔的环境界容易受到哥林斯堡的发展式生物学（developmental biology）、俄国的民族和空间研究以及塔尔图的理论作品的影响。

当谈到塔尔图的符号学时，人们通常指的是塔尔图—莫斯科科学派（Tartu-Moscow School），也就是 20 世纪 60 至 80 年代在人文科学领域内极为重要、影响深远的知识分子运动。该学派的大部分代表人物来自莫斯科，因此，塔尔图—莫斯科科学派或莫斯科—塔尔图学派（Moscow-Tartu School）的名称与此相关。但实际上，从组织上说，该学派的中心在塔尔图，因为其领军人物尤里·洛特曼在塔尔图大学任教，暑期培训班是在爱沙尼亚组织的，而且世界上第一本符号学期刊《符号系统研究》（*Trudy po znakovym sistemam*, *Sign Systems Studies*）是于 1964 年在塔尔图出版的。

在这里，我们想指出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即实际上，塔尔图的符号学研究

并不止于 20 世纪 80 年代，也不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它有着自己的史前史，也有着自己的未来——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它一直在发展。2000 年的《欧洲符号学研究》(*European Journal for Semiotic Studies*)以“新塔尔图符号学”为题推出了一期专题 (Bernard *et al.*, 2000)。这一名称描述了自塔尔图大学于 1992 年成立符号学系以来的时期所具有的特点。

迄今为止，这一时期的发展已有 20 余年，它的主旨可以描述如下^①：

1. 符号学被理解为研究所有生命系统，即包括了所有生物物种的符号过程的科学；
2. 研究的目标在地理学上有所不同，文化分析中纳入了对文化和生态系统关联性的思考；
3. 符号学作为正规的大学学科课程，教授给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②

第一条和这样一个事实有关：两大符号学传统，即始于洛特曼的文化符号学和始于乌克斯库尔的生物符号学，共同构成了当今塔尔图符号学的基础。^③然而，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融合这两大传统的尝试就已经开始：在塔尔图和其他地方都如此。在塔尔图，洛特曼和生物学家群体的关系得以建立，这些生物学家中有人对乌克斯库尔的思想遗产感兴趣，并致力于寻找它和符号学的关联。其他地方的代表性研究是西比奥克的著作，他在著作中将模塑系统作为遍及所有符号系统的概念来使用：这些符号系统既包括以语言为基础的（文化）系统，也包括前语言的动物系统。^④洛特曼的传记作者，美国的符号学家爱德娜·安德鲁斯 (Edna Andrews) 提到，洛特曼的系统无疑是和西比奥克、

① 详见 Kalevi Kull; Silvi Salupere; Peeter Torop. "Semiotics in Estonia". 2011, *Sign Systems Studies* 39 (2)。

② 关于第 2 条，生态符号研究在文化符号学中的作用需要单独的分析，最近这一主题的相关出版物详见 Tiina Peil (ed.), *The Space of Culture – the Place of Nature in Estonia and Beyond*. (Approaches to Culture Theory 1.) 2011, Tartu: Tartu University Press. 第 3 条则详见 Katre Väli; Kalevi Kull. "An international masters program in semiotics is created at Tartu University". 2008, *Semiotix* 13。

③ 彼得·特洛普写道：“多亏了塔尔图这个地方，这里的符号学家们有幸继续两大传统观，将乌克斯库尔的传统和洛特曼的传统相叠加。”

④ “西比奥克……在洛特曼语言观的给定感知作用中看到了索绪尔或一般的符号学家所不具有的对生物学的开放。他因此得以将德国的爱沙尼亚裔生物学家乌克斯库尔的内在世界 (Innewelt) 和俄国爱沙尼亚裔的符号学家洛特曼的模塑系统熔铸为一体，组合为一个三层的模塑系统。” (Cobley *et al.*, 2011: 8–9) 见 Sebeok 1994。

雅各布森以及乌克斯库尔提出的模式相一致的。^①

我们在这里想要证明：乌克斯库尔和洛特曼的关联性可以是很深刻的。这是我们所说的，他们的著作共同构成了我们称之为塔尔图符号学的传统基础。

我们也看到，乌克斯库尔和洛特曼的方法的理论融合（这可能不像看起来那么容易）是当代符号学的核心，它的任务在于发展出一套理论和方法论的装置，可以界定和说明广义符号学的范畴，并可以被当作符号学所有分支的基础。我们希望塔尔图的符号学在其间发挥作用。

以下是对乌克斯库尔和洛特曼的著作进行的比较，^② 我们列出了他们共同的方法中的一些特点。

一、环境界和符号域的基本概念

当乌克斯库尔描述人和动物的世界时，^③ 他需要一个综合性的基本概念，为此，他引入了环境界的概念。当洛特曼描述思维、文本和文化的世界时，^④ 他也需要一个综合性的基础概念，由此引入了符号域的概念。

环境界是生命体的世界，是已知的世界，或者说模塑世界。它由符号关系、生命体的辨别和生命体辨认或处理的一切所组成。符号域则更为广义：它不要求对某个特定的生命体进行聚焦，它覆盖了所有生命体。

一个符号只有在具有其他符号的语境中，才能够表意。洛特曼坚持认为，符号空间先在于符号域中的单独文本和文本间的相互关系，这和皮尔斯所说的，每一个符号都源于另一个符号（*omne symbolum e symbolo*）的原则是类似的。在生物学上，与之类似的关系则见于雷迪定律（早在 17 世纪就已经阐明）：每一个生命都源于其他生命（*omne vivum e vivo*）。它的另一个版本则是

① Edna Andrews. *Conversations with Lotman: Cultural Semiotics in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Cognition*. 2003,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p. 24.

② 关于洛特曼详细的传记和学术生涯的记录见 Ann I Shukman. *Literature and Semiotics: A Study of the Writings of Ju. M. Lotman*. 1977, Amsterdam: North Holland; Edna Andrews. *Conversations with Lotman: Cultural Semiotics in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Cognition*. 2003,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而乌克斯库尔的则见 Kalevi Kull. "Jakob von Uexküll: An introduction". 2001, *Semiotica* 134 (1/4), 1-59; Florian Mildenberger. *Umwelt als Vision: Leben und Werk Jakob von Uexkülls (1864-1944)*. (Sudhoffs Archiv 56.) 2007,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Verlag.

③ 见乌克斯库尔 1934 年的笔记（2010 出版）（Jacob von Uexküll. *A Foray into the Worlds of Animals and Humans*. 2010 [1934],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④ 见洛特曼 1990 年的笔记（Juri Lotman. *Universe of the Mind: A Semiotic Theory of culture*. 1990, London: I. B. Tauris, P. Xiii.）。

乌克斯库尔在《理论生物学》引言中所描述的：每一个设计都源自其他的设计。^①

洛特曼是在阅读维尔纳茨基时得到灵感，对符号域的概念进行了阐述。有趣的是，爱德娜·安德鲁斯评论说：“乌克斯库尔的环境界和维尔纳茨基的生物域（biosphere）原则共享了许多同样的基本概念。”^②

她补充道：“在最后的分析中，洛特曼对符号域的元文本层面赋予的重要性正如乌克斯库尔对环境界的元解释所界定的重要程度。”^③

环境界的概念和环境的概念在根本上是不同的。环境界包括感知和行动（*Merkwelt* and *Wirkwelt*）。生命体的内在世界和环境界之间的关系，类似于洛特曼对文本和外文本现实（或者说语境）之间关系的看法。洛特曼经常用“生命体”来比喻“文本”，因此，文本并不只有结构和自动性，它还有内部的动力机制、生理学。如同环境界是生命体的结果一样，与之类似的是，如洛特曼所说，外文本关系也是文本的产物。^④

二、自我传播的初始性

乌克斯库尔和洛特曼都认为自我传播是传播的开始。它也和这样的理解相关：翻译是意义出现的过程。

在这里，我们要再次引用爱德娜·安德鲁斯的观点。她写道：“在乌克斯库尔的理论 and 洛特曼的符号域模式之间，有着许多有趣的重合，两者都认为自我传播是符号解释所必需的。洛特曼的自我传播模式……将意义产生机制定义为两种模塑类型的结合：我一我（或自我）传播和我一他/她传播。”^⑤所有的文化空间都有赖于信息生产和传递的模塑系统。……在洛特曼看来，自我传播构成了两种能力的基础：质性上的重构能力和在意义文本的创造中翻译不少于两套符码和信息的能力。在乌克斯库尔看来，自我传播的初始性，为可能确定

① 原文为：“An der Satz: *Omnis cellula e cellula* darf man den Satz hinzufügen: *Alles Planmässige aus Planmässigem*” (Uexküll 1920: 6). 在这里我们可以加上格雷戈里·贝茨 (Gregory Bateson) 类似的观察：“精神世界只是无限的地图中的地图”。

② Edna Andrews, *Conversations with Lotman: Cultural Semiotics in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Cognition*, 2003,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p. 64.

③ Edna Andrews, *Conversations with Lotman: Cultural Semiotics in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Cognition*, 2003,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p. 68.

④ Edna Andrews, *Conversations with Lotman: Cultural Semiotics in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Cognition*, 2003,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p. 63.

⑤ Juri Lotman, *Universe of the Mind: A Semiotic Theory of Culture*, 1990, London: I. B. Tauris, pp. 21–35.

的任何元解释提供了背景。考虑到每个环境界的结构，我们可以说：在乌克斯库尔的模塑系统中，所有的意义都是通过翻译创造的：翻译是一个必定以元解释的形式来提供结果的过程。这一点是很清楚的。

彼得·特洛普也描述了自我传播概念在塔尔图学派中的作用：“在文化层面上，将自己表现为发送者和接收者之间的传播和对话过程的，在更深的层次上，可以被视为文化的自我传播和文化跟自己的对话。”^①

三、控制论和符号学

在研究复杂调整反馈系统结构的意义上，在对复杂行为机制的兴趣上，控制论的方法和乌克斯库爾、洛特曼的方法很接近。但是，尽管他们都倾向于数学式的条理思维，但两人的著作中都没有直接使用数学方法。

乌克斯库爾被视为生物控制论的先驱。他对肌肉调节运动和对海洋无脊椎动物强直性痉挛进行研究，由此发现了所谓的“乌克斯库爾定律”。这是他的功能圈（*Funktionskreis*, functional cycle）模式的基础，该模式是形成环境界的核心机制。贝塔朗菲（Ludwig von Bertalanffy）在发展他的一般系统理论时，深受乌克斯库爾著作的影响。许久之后，勒内·托姆（René Thom）的模塑符号过程的方法也受到乌克斯库爾影响。

除了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控制论在塔尔图—莫斯科科学派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是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和罗斯·阿斯比（W. Ross Ashby）的著作，它们为对主体及其环境之间关系的发展进行对话性的理解（这和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苏联所阐释的达尔文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不同）提供了一个视角。在20世纪40年代晚期，苏联禁止了控制论之后，控制论的思想仍在发展。将符号系统作为模塑系统，无疑是一个标志着符号学与控制论思想之间关系的概念。除了爱沙尼亚首届符号学暑期培训班的参加者、数学家乌斯宾斯基（Vladimir Uspenskij）之外，那一时期杰出的俄国数学家和控制论者科尔莫戈洛夫（Aleksander Kolmogorov）也对塔尔图—莫斯科科学派起到了显著影响。

这一时期之后，我们可以在洛特曼的作品中找到几处提及普利高津（Ilya Prigogine）的地方。

^① Peeter Torop. "Translation as communication and auto-communication". 2008, *Sign Systems Studies* 36 (2), pp. 375-397.

四、康德的启示

乌克斯库尔经常在他的著作中援引康德，而洛特曼更像是一个“隐藏的”康德主义者。显然，在解决认知论的问题方面，康德是他们重要的前辈，而问题的答案本身明显就是符号学，它已经极大地偏离了康德的分析。

托尔·乌克斯库尔（Thure von Uexküll）谈到了他父亲的主要著作《理论生物学》：“乌克斯库尔讨论了两个康德的概念，赋予了它们更多的生物学意义：作为我们直觉形式的、先验范畴的时间和秩序，以及先验图示（schema）。”^①

约翰·迪利（John Deely）这样说乌克斯库尔：“在现代的生物学家中，他是在将德国唯心论转向符号学上做得最多的。……乌克斯库尔延伸了康德对生物学的观念，而这一种超越是康德的范式并不允许的，即客观地完成了、抓住了由符号关系达成的主体间的主体间性的一致。”^②

在两位学者的观点中，对康德认知论的偏离都是很重要的。乌克斯库尔提出了不同物种特有的感知范畴，它导致了功能圈的运作。洛特曼提出，只有通过追溯多个不同的模塑系统之间的不一致，感知的范畴才能得以凸显。感知范畴的不一致也是皮尔斯的理论基石之一，他将范畴重新命名为第一性、第二性和第三性，并且提议将试推法作为符号再现的关键要素，它不会失去通向范畴、物和物的自身组成的路径。^③

对二律背反的分析，对准确性而努力追求，是乌克斯库尔和洛特曼作品的共同特征。

五、进化的非经典

乌克斯库尔公开地表达了他的非达尔文观点，直接批评了海克尔（E. Haeckel）。他遵循并发展了贝尔的生物学理论，该理论认为系统学是个体发生学的衍生物（进化是发展的衍生物），而不是相反，就像达尔文的生物学所认为的那样。乌克斯库尔的这种观点是在他早年求学于塔尔图时形成的，尽管（或者是由于）他师从的是一位信奉达尔文主义的教授。在乌克斯库尔看来，达尔文生物学的科学性是不够的。

^① Jakob von Uexküll, *Kompositionstheorie der Natur: Biologie als undogmatische Naturwissenschaft*, (Uexküll, Thure von, ed.), 1980, Frankfurt am Main: Ullstein, p. 55.

^② John Deely, *Basics of Semiotics*, 5th ed. 2009, Tartu: Tartu University Press, p. 157.

^③ 写成这一段，我们要感谢泰勒·班尼特（Tyler Bennett）。

乌克斯库尔强调生命体作为积极进行选择 and 筛选的主体的作用，这和达尔文式的观点中的环境选择（或者自然选择）不同。

生物学中的结构主义观点是非达尔文主义的。该观点的一些代表人物（亚历山大·柳比谢夫、朱利叶斯·施瑞德）和塔尔图-莫斯科学派关系密切，由此出现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符号系统研究》中。洛特曼的历史进程模式将其视为爆破和停滞的交替，以及在自我传播基础上的文化二元和三元分裂，使我们联想到一些后来的进化理论（如古尔德和艾德瑞奇）。

洛特曼的理论涉及生物方面并非偶然。在他年轻时，在决定研究文学之前，他是准备成为生物学家的。

六、重建的符号学经典

乌克斯库尔和洛特曼都没有直接地遵循任何符号学的经典。

由此，事实上，“因为他（乌克斯库尔）并不懂皮尔斯或索绪尔，也没有使用他们的术语，很容易就能把他的理论用到任何知名的符号学派的思想”^①。

洛特曼经常援引索绪尔和雅各布森的著作，但他的研究并非是以早期的符号学经典为基础的；相反，他是在发展出自己的观念之后，才向前者学习的。

当然，人们也应当注意到，现在所教授的符号学历史主要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被建构起来的；符号学的制度化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到那时它才开始要求有自己的历史。

七、对主流的反対

乌克斯库尔和洛特曼两人都不属于他们那个时代的主流，两人都是学术上的异见者。他们反对主流思想，然而，在他们所属的支脉中，他们也还是异见者。

乌克斯库尔反对机械论者和达尔文生物学。他的研究方法属于整体生物学（holistic biology），该学说在 20 世纪的头一二十年有所流行，随着现代综合论（Modern Synthesis）在 30 年代出现，生物学中的物理主义者占据了主流，乌克斯库尔的观点随之被遗忘了三四十年。

^① Thure von Uexküll. "The sign theory of Jakob von Uexküll". In: Krampen, Martin; Oehler, Klaus; Posner, Roland; Sebeok, Thomas A.; Uexküll, Thure von (eds.), 1987, *Classics of Semiotics*. New York: Plenum, p. 148.